



新世纪基础教育教材教法研究系列

高中语文新课程 高效创新教学研究

新课标 · 新理念 · 新教材 · 新策略 · 新方法

史绍典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基础教育教材教法研究系列

高中语文新课程 高效创新教学研究

新课标 · 新理念 · 新教材 · 新策略 · 新方法

史绍典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中语文新课程高效创新教学研究/史绍典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6

新世纪基础教育教材教法研究系列

ISBN 978-7-307-06389-1

I. 高… II. 史…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高中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162 号

责任编辑:王春阁 叶玲利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5.25 字数: 461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389-1/G · 1204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教育部于2001年6月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当年秋季在全国实行基础教育新的课程体系。不同学科的《新课程标准》取代原有的《教学大纲》同时实施，不同版本的学科实验教材也相继进入实验阶段。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广大教研工作者、一线教师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这一场基础教育领域深刻的变革中。新的课程理念、新的教材体系、新的评价体系冲击了中国教育固有的传统观念，课程改革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今年是一个吉祥的奥运年，也是我国及我省高中学段的新课程改革承上启下、以点带面地施行学科《新课程标准》并使用新教材的年份。包括我省在内的全国大部分省市在总结实验区课程改革经验和共享资源的基础上，正式启动普及层次的课改程序。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及业务研究部门应致力于奠定新课程改革的基础，不断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对课程改革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积极推进课程改革的责任感；创造有利于课程改革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坚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用素质教育的观念来理解和指导新课程改革；把握课程改革的关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指导教师调整知识结构，展开围绕新课程改革主题的系统教研，把课程改革与教师发展紧密结合；营造和谐的与课改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强化对课改的宣传力度，集合社会多种力量来支持和参与课改。在依靠中学广大一线教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师范院校、教研机构内的教授、专家和专业研究者的特殊作用，为课程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力量。在普及型多级多层次的实验中逐步建立新的课程观、学习观、教学观、方法观、策略观、目标观、质量观和评价观并进一步充实

我们共有的课程改革教育教学资源。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教师教育特色的教学研究型院校，多年来为我省中小学教师的职前职后培训做出了较大贡献并起到基础教育研究的引领作用。适逢2008年我省高中新课改全面启动之际，为配合新课标、新教材的实施，该院组织外语系、数学系、湖北省教研室的部分教授、专家、特级教师对高中课程改革框架内的学科课程标准、教材教法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并将专家们近十年悉心探讨的心得体会、标准解读、教材剖析、方法探索写成专著，在充分剖析不同学科《新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对教材教法进行了三维五层次的探索。第一阶段成果《初中英语新课程教学法》经教育部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审订，推荐用做全国“新课改”教师培训使用的课程资源，深受全国广大初中英语教师的广泛欢迎，并创下连续七次重印的佳绩。我相信该专家团队的第二阶段研究成果《高中英语新课程高效创新教学法》、《高中语文新课程高效创新教学法》、《高中数学新课程高效创新教学法》等高中新课程教材教法研究系列的推出能为我省乃至全国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新教材的合理使用，新方法的实践探讨做出有益的和能够满足期望值的贡献。

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 黄 俭

2008年3月



我们正在经历着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八次课程改革。

我“笑谈”课程改革的“根由”，对课程理念的追寻不说罢了，我引用林语堂先生的一段话，从另一个侧面，“戏说”课程改革之必要。

林语堂先生在数十年前说到“学习”，他说：“所谓学习就是喜爱，学生应该对读书发生狂喜。但是从小学到大学研究院，教师有一种天才，就是把读书的乐趣挤出，使之变得干燥乏味。”^①林先生所说的是教学背景下的“读书”，这个“读书”当然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是学生在学校里的所有的“学习”活动。

林先生用他惯常的幽默，揶揄我们教师，实际表达的是他对课程实施、对教学状况的不满。认真检讨，林先生讽刺的这种状况，几十年来何尝不是一直延续着的呢？

这样说来，改革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语文学科而言，中国的学科意义上的“语文”，筚路蓝缕，走过历经坎坷的百年，伴随百年来的风云际会，“语文”晴雨表式的反映着近现代每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语文”的确承载了许多，丢失了许多也异化了许多。

语文课程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迭经起伏，迨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风起云涌，“语文”从“世纪困惑”^②走出，至今也有30个年头。

多年来，对语文的批评或语文的自我挣脱，无不关乎语文教学的效率，

① 林语堂. 论学问与知趣. 林语堂集,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② 1997年第11期《北京文学》推出一组三篇文章: 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集中批评中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全国性的强烈反响。《羊城晚报》1998年3月27日头版头条刊载洪禹平、杨东平文章《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文章在历数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时，引用一位搞了半个世纪文字工作的老编辑的话说，这已不是误人子弟的问题，而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所有的教师、父母、孩子都在为语文教育的错误付出宝贵的生命。

“低效”、“有效”、“高效”，从来就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学生对语文学习发生“喜爱”乃至“狂喜”，就是语文教学的“有效”乃至“高效”，讨论效率的起点及其归属，指向的当然都是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为着学生喜爱语文而作。

近现代语文教育已经百年；

改革开放，当代语文改革已经 30 年；

我个人从事语文教学及其研究已经 40 余年；

书中所谈，多是我面对上述年头里关乎语文的心得。

感谢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黄俭为本书作“序”，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王春阁、叶玲利细致、负责的工作。

仅以此书献给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成立 30 周年^①。

史绍典

2008. 6

^①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 1979 年成立于上海。



绪言	1
第一讲 中学语文教学现状检讨	9
一、泛政治化	9
二、模式化	12
三、功利化	13
四、浮躁化	16
五、去语文化	17
六、误读	24
第二讲 中学语文教学低效反思	25
一、没有“读书”的“探讨”	26
二、没有个性化解读的问答	26
三、没有整体感知的寻章摘句	27
四、没有积累与感悟的流程	27
五、没有正确导向的评价	28
六、“好课”也低效	34
第三讲 中学语文有效教学	38
一、关于“有效教学”	38
二、有效教学的通常意义	40
三、有效教学的特征	41
四、有效教学的三层分析	42
五、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	51

第四讲 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新背景	62
一、培养目标新要求	62
二、课程改革新目标	63
三、语文性质新定位	64
四、师生阅读新概念	77
五、多重对话新背景	80
第五讲 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新理念	94
一、改革纲要与语文教学	94
二、新课程究竟改变了什么	97
第六讲 中学语文课堂评价和教学管理的新变化	108
一、关于评价的一般性描述	108
二、课堂评价逐渐成为教师一种自觉行为	112
三、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	113
四、课堂评价中学生获得了参与的自由	115
五、课堂评价越来越成为教师的教学反思	116
第七讲 高效创新教学诠释	126
一、关于高效教学	126
二、关于创新教学	135
第八讲 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一）	
构建语文“生态”课堂	140
一、教学本质解析	140
二、创新空间拓展	142
三、媒体运用考量	143
四、“生态”课堂构建	145
第九讲 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二）	
让语文课堂更加充实、丰满	157
一、经典回放	158
二、课堂聚焦	161
三、课例沙龙	169

第十讲 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三）	
网络与作文教学·····	175
一、媒体与教学·····	175
二、教学媒体的教育作用及教学功能特性·····	176
三、远程教学·····	178
四、来自高三实验基地的报告·····	180
第十一讲 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四）	
训练与语文教学·····	193
一、固本的“双基训练”·····	193
二、训练检讨·····	194
三、训练的思考·····	196
四、“训练”也需要训练·····	199
第十二讲 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五）	
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	206
一、课程资源的两种载体形式·····	206
二、课程资源筛选机制的两个重要原则·····	207
三、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途径·····	207
四、课程资源建设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07
五、课程资源整合的案例·····	208
第十三讲 中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19
一、认识我们的学生·····	219
二、认识我们自己·····	222
三、认识我们的困境·····	223
四、认识我们的出路·····	225
五、发展我们自己·····	226
六、发展的途径·····	230
第十四讲 高中语文教材简析（以人教版教材为例）·····	235
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介绍·····	235
二、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选修系列介绍·····	242

第十五讲 中学语文教学案例评析·····	268
第十六讲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	301
一、选修课：“共同基础”上的个性化提升·····	301
二、选修课：与必修课区分·····	303
三、选修课：课程目标·····	304
四、选修课：课程内容·····	306
五、选修课：课程评价·····	308
六、选修课：课程实施·····	309
七、选修课：选课程序·····	309
八、选修课：高考·····	310
第十七讲 另一种学习·····	324
一、美国语文教学介绍·····	324
二、香港《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 介绍·····	336
附录 回归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探索作文训练的新序列·····	356
面对社会、人生的思索——2007 年全国高考作文评述·····	375
参考书目·····	393



我又坐在案前，述说我挚爱的“语文”了。这是一个始终说不尽、道不完，绕不开、究不透的话题。

我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汉民族语文教育，至少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是经学和科举的工具、附庸，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初，清政府推出“新政”，实行“改革”，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故称为“壬寅学制”。这个学制未有实行。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年是癸卯年，故称为“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后在全国实际推行的学制，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学制。它对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等各学科的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法等做了原则规定。是年始，“语文”从读经中剥离，成为在全国推行的学科意义上独立的学科。

也正是经由这一年，“语文”开始了它百年坎坷的历程……

有论者指出，中国的语文教育，每十年就要“折腾”一次：

“五四”运动后，因推行国语、白话文教学，产生了“文白之争”，在倡导白话文教学的初期，人们将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如质量的下降，统统归罪于白话文教学。到1934年，恢复文言教学的呼声大涨，从而引发了关于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争。

如果深入一步历数百年来对语文的批评和讨论，大致有：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中学生国文成绩低落”问题的讨论，40年代初期关于“抢救国文”问题的讨论，1953年开始的《红领巾》观摩教学的讨论，1956—1958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5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到60年代的“文道之争”。1978年3月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开始了“文革”之后对语文教学的批评和讨论。到了80年代，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90年代，“淡化语法”的讨论、语文学科性质的论争、语感问题以及文学教育问题等的论争，此起彼伏，最终导致语文教育遭遇“世

纪末的尴尬”^①。

.....

真正是百年语文，百年纷争！

以至于今天我们来谈论中学语文教学，似乎连如何界定“语文”、如何界定“语文教学”都是很犯难的事情了。

那么，“语文”是什么呢？

《语文课程标准》^②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语文课程标准一出，持续的有关语文性质的论争，似乎渐渐止息。这里，一方面显现着作为国家“标准”的权威性，它几乎是最终裁判式地判定了“语文”之是什么的问题，因而得以扬汤止沸；另一方面，则是语文终于又有了更为宏大的属性——“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囊括四海、包举八荒”的架构，足以让语文有了雄视世间万事万物的根基。作为一辈子献身语文事业的我们，感到了莫名的荣光。难道还有必要为语文其他的细末小节去喋喋不休吗？

而我个人对语文的认识，则可以说是“朴素”的。2000年，应《中学语文教学》“世纪寄语”之约，曾写下我的认识。

我写道：语文永远是语文^③。

我这样来述说：

世纪末，一声惊问：语文怎么啦？“语文”自从从读经剥离出来，在历经百年沧桑后，仍然是让人大惑不解。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惊问了。下一个世纪，这样的话题恐怕还要重复。

我想，首先，是“语文”自身不要怕人责难。“祸国殃民”也罢，“误尽苍生”也罢，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鲁迅先生尚且说：“人生识字糊涂始。”那岂不是说，教人识字的先生更是叫人糊涂的祸首？其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可见此种议论也绝不是毫无来头。

其次，“语文”要有自身的定位。你是干什么的？语文，不就是读书识

① 王富仁，郑国民。当代语文教育论争。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②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③ 史绍典。语文永远是语文。中学语文教学，2000（11）。

字、造句作文，不就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不就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不就是“工具”、“人文”，等等吗？概念万千，话语万千。那么，有没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在？譬如，“红学”、“三国学”、“水浒学”，等等，学派林立，阐释各异，而九九归一，不都要归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林林总总的各家各派“语文说”，归向哪里，还不是“语文”！我想说的是，你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则任它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这一瓢是什么？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地教学生读书识字、教学生阅读作文。由语文而起，旁及的话题，如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生活、自然、人生，道德、理想、情操，等等，都由此而衍生。教育的精髓，育人的要义，也只是潜移默化其中而已。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语文亦当如是。

说到另一个话题，语文要不要改革，回答是肯定的。但改革必须立足于“继承和发扬传统”，立足于“中国特色”。时下给语文号脉开方的太多了：“返璞归真”、“联系生活”、“探究人生”，等等，更有“新洋务派”，舶来洋货，以奇新眩人。凡此种种，取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为上。一位年轻的学者说得好，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

怎样教、学语文，我亦有陈年佳酿，曰：重在基础，讲求实效，实活相济，读书第一。此为老生常谈，但不讲不行，当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重在落实。

怎样落实，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有一则箴言：字要规规矩矩地写，话要清清楚楚地说，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练习要踏踏实实地做，作文要认真真地完成。说得真好。惜“课文”一说，涵盖太窄，加宽阅读面更功德无量了。以此为基础，注入新理念：“学生本位”、“自主探究”、“发展为本”、“终身学习”，等等，不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语文”了吗？

世纪更替，正是人类反省自己的最好时机。据说，第一个千禧年来临之际，基督徒都很紧张，因为耶稣要来人世巡查，看看人类是否按照他们与上帝的约定行事了。20世纪已逝，21世纪已来临，我们则大可不必紧张，我们按语文的自身规律行事，上帝于我何碍。

即使到下个世纪，语文还是语文。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话语，我在语文界便有了一个独有的派别：“语文永远是语文”派。

而实际上，人们在述说“语文”的时候，往往又是概念不清的。说“语文”，总是没有分清“语文”所涵盖的方方面面，如，是语文教学、或是语文

教材，是语文教师、还是语文课程，等等。而“语文”，又有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等。方方面面，衍生出无尽的话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是当然的。

近读范曾先生《吟赏风雅》^①，他在“引言”中谈及“风从哪里来”，洋洋洒洒，极妍极美。“风在哪里？在天边的云丝雾影，在陌上的柳絮蒿蓬；在春天偃伏的碧草，在秋天飘雾的丹枫；在高樯的一叶帆，在骥尾的千条线；在寺院的幢幡，在心头的旗旌。风在哪里？禅家告诉你：听，爽籁在天。宋玉说，在青萍之末，在腐余之灰；苏东坡说，在木叶尽脱的树梢，在明月徘徊的江上。风在哪里？风在高渐离易水的寒筑，在诸葛亮赤壁的草船，在汉高祖威加海内的战袍，在岳武穆声彻天外的霜蹄。……”

呵呵，风之解说尚且如此之多，更何况语文？

我想，风之林林总总，犹语文之飘逸恢弘也。飘逸，谓“语文”之不易把握；恢弘，谓“语文”之博大精深。

然而对语文，往往批评较多。尤其是，语文教师教学的好坏、语文教材编写的优劣、语文教学组织的当否，都导致批评的矛头直指语文课程。

课程专家说，“课程”一词源于拉丁语的 *currere*，意指“跑道”（*race-course*），转义为“学习之道”（*course of study*）。就是说，“课程”的原本意义是指根据教育目标，为指导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有计划地编制的教育内容的整体计划，是旨在塑造新生代未来人格而设计的蓝图^②。就课程而言，又有林林总总的阐释。我不想在此又节外生枝，演绎出许许多多“课程”的语义及其意义来。我比较倾向“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教育研究革新中心”（OECD. CERI）的界定，他们倡导的“课程”，包含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材、教学活动及教学评价在内的广义的概念，把“课程”界定为涵括了“显在课程”（*overt or manifest curriculum*）与“潜在课程”（*hidden or latent curriculum*）在内的赋予学习者的“学习经验的总体”^③。

我们现在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课程论的涵盖之下，来谈论“中学语文教学”的。

还有，今天谈语文，考量其背景，又是放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的。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第八次课改。这里，我们应该对我国的课程改革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① 范曾. 吟赏风雅.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汪霞. 国外中小学课程演进.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③ 钟启泉. 现代课程论.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被誉为美国课程理论“圣经”的《理解课程》([美]威廉·F·派纳等著),洋洋百万言。书中详述了美国课程领域经过“概念重建”之后的发展,对“政治课程理论”、“种族课程理论”、“性别课程理论”、“现象学课程理论”、“后现代课程理论”、“自传性课程理论”、“美学课程理论”、“神学课程理论”、“制度课程理论”、“国际课程理论”,等等,做了全面而透彻的剖析。关于课程开发实践的诸多问题,如“课程政策”、“课程规划、设计与组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与教师”、“课程与学生”,等等,亦做了别开生面的、前沿性的研究。尤其对我国的课程改革,也有精到的阐述。研究一下继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之后的这部最伟大的课程论著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看法,可以为我们解读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提供新的视点。

威廉·F·派纳认为,中国当代教育的方向,是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4年期间确立的。“边区政府”^①表述了有关适合中国课程的三个独特见解:(1)课程应该满足大众社会的需求;(2)课程应该渗透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3)课程应该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联系。这种见解,表明威廉·F·派纳等对中国课程认识的深刻性。

我们不必细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新一轮课程改革推行期间,历经的七次课程改革的状况。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中国当代课程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1)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课程重组;(2)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课程加强;(3)1977—1990年“文化大革命”后的现代化。其每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

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课程重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实施培养有共产主义理想和又红又专工人的教育目标。其次的教育目标,比如对占10岁以上人口80%的文盲进行扫盲,将相当多的精力花在简化(或政治化)小学所用的阅读材料及推广简化的语音系统。当时,整个学校课程逐步地在所有年级删除传统元素,为知识课程留出空间。数学和科学受到了重视。1954年,中国与原苏联签订了有关科学和文化合作的协议。随后的六年,原苏联的教材和方法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俄语与英语相互竞争,成为中学里最流行的外语。重要的教学时间让给了生产工作,一些学校还建起了小工厂。虽然50年代毛泽东发起了改革,并且变革的重点是又红又专的公民。但有证据表明,在许多学校那些没受重组影响的教师仍继续着传统的实践。正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教育制度上意义更为重大的巨变。

^① “边区政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毛泽东发起了旨在根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在学校里广泛流传。在这一时期，高等院校被关闭了，课程被缩短了；知识分子受到歧视，脑力劳动者被送到乡下与农民一起劳动；正式的入学考试被取消了，国家用了大量精力来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准以使其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学校课程都包含一个均衡的普通教育，语言、数学、社会科学、艺术、体育和生产劳动。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忠实于党和人民、有阶级觉悟、愿意进行阶级斗争、具有科学知识和勤劳态度的新型社会主义者。

总之，课程体现了1949年革命的目标和热望，就是在现代化时期寻求一种适合于中国大众社会而不是发展少数社会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教育。最终目的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遍布整个中国。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谴责“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整个人民带来了国内混乱和灾难。”

“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推翻后，当“文化大革命”逐步被批判时，许多教育政策和实践开始出台。例如，正式考试，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重新恢复。对职业教育和工厂生产的重视也减弱了。精英“重点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建立起来，并导致了对现存机构如“重点”大学和技术学院的认定。专业化的技术中学建立起来。文凭和学术称号也恢复了。理论和实践研究成为课程中的一部分。

1978—1979年，通过发布新的中小学国家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科学和数学受到了重视。观察家指出：

80年代，教育被更多地认为与生产和经济发展相联系，但其目标的达到则是通过对发展科学和技术理解的需求，以及必须培养能够将自己的学识应用到国家技术进步中的知识型干部。因此，“重点”学校的发展得到了优先考虑，并且其新的重点是寻找人才和专门培养知识分子。

90年代中国的课程对政治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红”和“专”之间的张力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但对经济的考虑已开始影响着当代课程的重点。此外，美中关系对教育的影响会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在交流项目上。从1949年直到70年代实行的政策，中美敌对不仅阻碍了外交关系，而且还阻碍了教育和文化联系。由此可见，课程开发是以教科书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的。于是，意识形态责任和在全球社会中培养中国现代化的专家之间的张力，继续成为90年代中国课程的中心特征。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课程